



鲁本·丰塞卡

20 世纪的巴西文学界可谓佳作频出,精彩纷呈。始于 19 世纪,由现实主义作家库尼亚开创并在 20 世纪飞速发展的“腹地派”显然是巴西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不过,尽管此派的开创者库尼亚具备极其高超的书写水平,但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批作家(以山寨法国浪漫主义小说的阿伦卡尔为代表)却大都因肤浅庸俗而广遭批评界诟病,即便是大名鼎鼎的“百万书翁”若热·亚马多也被人指责“缺乏深度”,而出自“腹地派”作家们之手的一些偏重于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品,如《干涸的生命》《黄金果的土地》等,其历史意义实际上远大于其文学意义。“腹地派”当中的惟一例外当属吉马良斯·罗萨,他的长篇小说《广阔腹地:条条小径》在叙事风格上类似于威廉·福克纳,其语言的独创性又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詹姆斯·乔伊斯那本让读者和批评家们目眩神晕的《芬尼根守灵夜》。同时,20 世纪的巴西文学界还拥有高度关注内省、内化、存在与虚无的女性作家,倍受诗人伊丽沙白·毕晓普推崇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她的长篇小说《星辰时刻》与短篇小说《蛋与鸡》等至今仍然是热衷于文本分析的批评家们所热衷的对象。此外,与若热·亚马多同为“百万书翁”的埃里科·维利希莫,因为其锐如利刃,令人拍案的黑色幽默以及独到的讽刺与历史认知,显然也应忝列这一时代的一流作家阵营中。

除却上述作家,巴西还有一位声名斐然的“异类”:鲁本·丰塞卡,一位作品中弥漫着黑暗、异色、暴力、混乱以及感伤主义的奇妙作家。他于 2003 年荣获葡萄牙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卡蒙斯奖,同年亦获得了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文学奖,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颁奖。丰塞卡向来深居简出,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也鲜有接受媒体的采访。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至今有 20 多本长、短篇小说和电影论著等,其作品在英、法、德等多个国家均有出版,同时亦有不少作品被搬上荧幕。

批评家们普遍认为对 1954 年巴西总统盖图里奥·瓦加斯过世后巴西疯狂的政治与社会乱象进行了充分描写与刻画的长篇小说《阿戈斯托》(Agosto, 1990)为鲁本·丰塞卡的最佳作品,但最初以创作短篇小说跻身作家行列的丰塞卡毫无疑问也是一名极其优秀的短篇大师。由久久读书人引进的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萃取了包含作家最为有名的《新年快乐》(Feliz Ano Novo, 1975)与《索取者》(O Cobiçador, 1979)在内的若干短篇小说集之精华,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其短篇小说中的名作《索取者》。这个单看篇名颇有些怪异的小说就表象而言,是以第一人称描写的一个连环杀人狂的屠戮之旅。小说的主人



公/索取者在小说开始不久即宣布自己“拒绝给予,从此只索取”。这一宣告开启了一系列极致的暴力与无止境的疯狂,随之接踵而至的种种活动都围绕这一行为展开,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债的偿还,一种对应得之物的弥补,众人已经并且应该总是有欠于他,因为他一直并且永远是:思想者,朋友,主人,客人,守护者,过客,言说者,写作者,生者,在场”。(让-吕克·南希《慷慨,超乎赞美》)当然,作家笔下的这位“思想者”并非残酷无情单纯以杀戮与流血为乐的变态,屠杀并不是索取者的惟一,他从未停止过思

考、观察、阅读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一些活动和社交行为。他静默有时,呼喊亦有时;暴躁有时,温柔亦有时;疯癫有时,理智亦有时。如果说给予——作为社会人的惯常——曾经使索取者“不在”,那么索取——作为社会人的失常——则强化了他的“存在”。在小说的叙述中绵延无尽的杀戮支撑、滋养着索取者的形象,这一形象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耀眼:“我举起弯刀大喊:‘索取者万岁!’我又高呼一声,没有词句,那是一声悠长、强劲的嘶吼,要让百兽闻之丧胆,四处逃散。所过之处,沥青都要熔化。”在整篇小说中,他始终只作为索取者而存在,此前至轻至薄近乎于无、在小说中实际上并未被实际提及的“给予者”早已销声匿迹,随着索取行为的开展和索取者的生成而彻底不在。

有意思的是,丰塞卡并未让索取者成为绝对孤独的存在,在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他拥有了一名女同伴,不过,虽然丰塞卡的作品在很多时候都具有强烈的犯罪电影风格(如改编成电影的《年度人物》和《蟾蜍与斯帕兰扎尼》),但在该作品中,女性同伴的出现却并不意味着篇小说即将迎来一个邦妮与克莱德式的浪漫主义悲情终局。伴侣/同伴的出现,或者说又一索取者的生成使得索取行为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使得个体扩张成了群体,杀戮依旧,并将扩大,“我生命中的一环闭合了,另一环则刚刚开始”。闭合与敞开发生在电光火石的同一瞬,这是小说的终结,也是群体索取的开始。

《索取者》中这种看起来近乎过度而剧烈的直接描写很容易令人想及奥地利作家恩斯特·荣格尔在其日记体小说《枪林弹雨中》所记录的那种近乎于新闻书写之直白与战场摄影般直观的一系列鲜活可怖的场景,一系列对“恶”之在场的精彩辑录。然而在整篇小说中,所谓的“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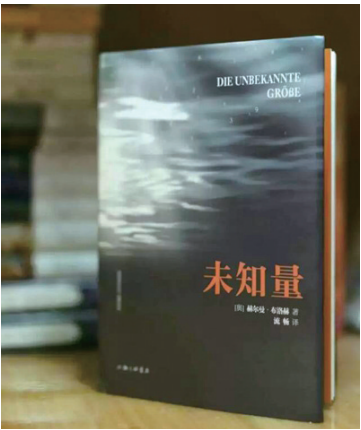
□林渊液

赫尔曼·布洛赫《未知量》： 小说是一种有意的、“科学的”构造

《未知量》并不是一本很容易读得下去的作品,这或许可以反过来印证,半个多世纪以来,布洛赫的小说缘何一直不见中文译本,即便他在欧洲文学界早已声名鹊起,并受汉娜·阿伦特、托马斯·曼、米兰·昆德拉等思想界和文学界大腕的倚重和推介。《未知量》情节简单,风格简淡,情感节制。主人公理夏德·希克是一位青年数学家,小说分别在他与家庭成员、与同事之间展开关系。家庭成员中,有过世的父亲、母亲、妹妹苏珊和弟弟奥托,而同事中除了两位教授和博士,还有他的两位年轻女助手,其中的伊尔莎后来成为了他的女朋友。按既往的小说阅读方式来解读,《未知量》大概只有一个细节可供叙述。父亲过世之后,原本幽灵一样的存在也已缺席。母亲却回到了过去,她一直强调不对生活抱有幻想,但幻想一直存在,并在丈夫过世之后继续萌芽。当最小的儿子奥托带来自己的伙伴卡尔之后,一种变态的私情背光生长起来。在几个孩子当中,理夏德耽于纯粹的理性认知,苏珊沉迷于自己的宗教世界,只有奥托这个充满艺术气质的孩子,敏感地觉察

了异样,在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一步步地绝望,并选择了死亡。死亡,是作者为理夏德安放的一颗炸弹,它把理夏德炸回到现实世界之中,包括对于爱情的收获。正如布洛赫自己所描述的那样:“(这部小说)应该描绘那样一种灵魂状态,纯粹科学的、数学的思维在其中通过它的极端理性必然转向它非理性的、神秘的立方面,它近似于康德通过‘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所表达的那种状态,乍看起来似乎显得荒谬,但它就是我们时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说完成于 1933 年。这个时间可以提示两重意义。其一,布洛赫遭受纳粹迫害,于 1938 年流亡美国,小说是流亡前的作品,创作于布洛赫所出生和成长的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艺术家们所关注的大都是个体在逐渐崩溃的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布洛赫在《未知量》中的探索与时代有着某些暗合。这大概可以解释,在小说里,理夏德在政治上的生命体验还是间接的,明显迥异于他后期的作品。其二,1929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小说中若干人物的命运也



与大时代息息相关,有了某些象征意义。理夏德的科学性无情地嘲讽了苏珊的宗教性,同时也战胜了奥托的艺术性,在这些较量 and 裂变中,它也慢慢地从理性认知的坚硬躯壳中逃逸出来,与非理性获得和解。在和解的过程中,奥托的死亡当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还有理夏德的爱情经历。他与伊尔莎的恋爱谈得稀松无趣,而他与另一个助手玛格努斯小姐的一场邂逅



赫尔曼·布洛赫

却往前推了他一把。在非理性的世界里,玛格努斯小姐充满女人味的存在,对于理夏德的蜕变无疑有着一种神秘的启蒙。布洛赫在赋予《未知量》以哲学探索的同时,也把一种特别的叙述视角带入小说之中。埃内斯汀·施兰特在《赫尔曼·布洛赫传》中把布洛赫《梦游人》中的叙述视角命名为“理想叙述者”,并认为它是布洛赫对 20 世纪小说理论的贡献。这种叙述技巧在《未知量》中同样存在:它们能让人注意到小说是一种有意的、“科学的”构造,不仅表达叙述内容,还知道风格、技术以及视角的局限。这种陌生的叙述经验,使文字充满了内在张力,一直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之中。对于读者来说,这种张力对小说的情节性起到了重要的代偿。



阿列克谢耶维奇



□顾超

为历史祛魅的纪实文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近作《二手时间》,带给人们的除了文学的审美,还有穿透历史的深刻洞察。苏联解体前后的历史真相极其复杂,难以给出综合而客观的评价。《二手时间》用复调式的写作手法表达出一个个小人物的内心独白,完整地勾勒出一幅后苏联时代的心灵图景。受访者不同语境和情绪的碎片连缀成篇,隐含在他们的倾诉之后的,是作者对政治秩序、价值观、生活与自由、苦难与幸福的思考。

《二手时间》驱散了笼罩在历史上的重重迷雾。苏联解体时,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了。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如此轻松地走向自由民主。福山在近年来写就的关于政治秩序的两卷巨著中反复强调了他最新的思考:良好政治秩序的实现有赖于强大国家、民主负责制和法治三者的平衡。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具备了形式上的民主和法治,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导师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核心问题:要限制权力,先要创造权力。苏联解体后造成的混乱、分裂、暴力、贫穷,表面上是经济、民族、宗教、政治等问题的交织,其实首要原因是巨大的权力真空造成的政治秩序的缺失。书里有那么多人说“厌倦了国家的混乱”,有那么多人在抱怨“自由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自由,而我们的生活一钱不值”,还充斥着警匪一家、黑帮横行的惨痛故事。诚如休谟所说:“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尽善化,但仍然必须承认权威乃其生存之必须。”有自由而无秩序,人们的生存会很艰难;有秩序而无自由,人们的生活会不幸福。“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这是被剥开的一层真相。

更让人不忍卒读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毁灭。也有人怀念那个时代:“公平分享、同情弱者、善良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而随着苏联解体,“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消费主义就是自由之王。”权力与资本赤裸裸的结合摧毁了机会平等、程序正义、等价交换、民主法治等健全的市场经济本应崇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市场万能只是更虚幻的乌托邦。核心价值不彰,虚无主义必然盛行,于是人们似乎只能在伟大精神与平庸生活中作出两难的选择。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与时代的悲剧。遗憾的是,价值一旦撕碎就很难缝补复原。斯大林极权主义带来的后续效应就是让获得了“自由”的人们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金钱和欲望编织的迷梦中不能自拔。急剧变革时代的俄罗斯,重塑价值比重振经济更重要,也更困难。

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通过回忆自己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作家、诗人的交往,看到了处于黑夜中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一点星火。阿列克谢耶维奇堪比伯林,并且她更擅长挖掘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幽暗。伯林的书中,始终有个“我”在观察、对话、叙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隐身在“他者”之后,她的忧虑和深思都已经藏在难民、技术员、医生、建筑师们的口述语言之中,苏联的宏大历史需要读者自己去抽丝剥茧,探索真相。复调不仅是写作技巧,更是一种人文关怀。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表面上都是晦暗不明的。直面真相、直抵灵魂,也许是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方法。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安徒生童话》
企鹅英文版封面,设计师:安德斯·尼尔森